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王逢振 主编

詹姆逊文集

Collected Works of Fredric Jameson

第9卷

时间的种子

王逢振 译

Fredric R. Jameson

The Seeds of Time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王逢振 主编

詹姆逊文集

第9卷

时间的种子

王逢振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詹姆逊文集. 第9卷, 时间的种子/王逢振主编; 王逢振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7-300-16407-6

I. ①詹… II. ①王… III. ①詹姆逊, F. -文集 ②后现代主义-研究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301825 号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詹姆逊文集 第9卷

王逢振 主编

时间的种子

王逢振 译

Shijian de Zhongzi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50 mm×228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印 张	13 插页 4	印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47 000	定 价	1380.00 元 (全 14 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作者前言

本书共三部分，原是 1991 年在加州大学欧文分校韦勒克图书馆所作的一年一度的系列演讲，目前的新标题旨在强调三部分之间某种更深刻的相互联系。甚至在“历史的终结”之后，似乎仍然存在某种历史的好奇性，这种好奇性具有一种总体的系统性，而不只是对轶事的好奇：不只是要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而是作为对我们的制度或生产方式本身的更大命运的一种更普遍的焦虑——对此，（一种后现代的）个人经验告诉我们，这种焦虑必然是永恒的，虽然我们从理智上认为这种感觉绝不可能，但对它的分裂或替代却提不出任何合理的方案。今天，我们似乎更容易想象土地和自然的彻底破坏，而不那么容易想象后期资本主义的瓦解，也许那是因为我们的想象力有某种弱点。

我已经开始认为，**后现代**一词应该为这种思想保留下来。这个术语及其各种各样的词组，似乎反而已经演变为各种党派对价值的表达，它们大部分取决于对这种或那种多元主义看法的肯定或否定。但是，这些是更容易以具体的社会术语（例如，各种女权主义的术语或新的社会运动的术语）来论证的观点。然而，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后现代主义，最好被理解为我们整个社会及其文化或生活方式中更深刻的结构变化的一种征象。

但是，由于那些变化仍是一些趋势，而我们对现实的分析又受到我们认为什么会保持或发展的支配，所以说后现代主义究竟是什么，几乎很难不涉及它究竟会走向何处这个更难的问题——简言之，就是要解开它的矛盾，想象它的后果（以及那些

后果的后果)，推测那些现在至多是某些倾向和潮流的东西在充分发展成熟之后会采取什么形态和机制。因此，整个后现代主义理论都是对未来的一种说明，具有不完善的一面。对“当前形势”的分析是否总是如此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一个我不想决定的问题：也许对现代主义的上千种看法，以某种方式比我们今天的看法更接近其现时的想象。对此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不论这些想象是什么，它们既不是上千种，也不是乌托邦的。

不论怎样，本书每一部分都试图分析判断文化的现状，展望其未来的前景，虽然很明显它们不可能在任何预言的意义上进行预测。但是，这三部分所作的分析判断依据的是三种相对不同的方法论的运作。第一部分论当代思想和意识形态的二律背反，不考虑各种立场观点的不连续性，找出一些关键的地方，在这些地方，甚至对立的观点似乎也共同面临一种概念上的困境，而这种困境没有在任何地方以其自身的方式加以说明或反映过。因此这里所作的设想是：一批特殊的观点和文本（它们本身或多或少是连贯的、自成一体的）共有一种无法表现的基础，这种基础只能作为大量的逻辑悖论和无法解决的不合逻辑的概念来传达。当然，这些都不可能从任何更高的观点来“解决”，而且我料想还存在着比这里所列的更多的二律背反（或至少它们有更多的表现形式——诚然，逻辑学家可以将它们归纳为某种更简单的原始形式）。在一种这里仍然只具粗浅轮廓的雄心勃勃的想法当中，我觉得应该做的是，为许多当代（即后现代）争论中看似最关键的问题提供一个外貌和一种无法表现的外部状况。未来像许多相互关联的遗传学信息似的缠绕于那种无法表现的外貌。所以，这一部分是试图表现矛盾的运作方式的一种实验，因而根据辩证法的某一种运用它可以称作辩证的，即使它一开始所依据的是一种受到阻滞或抑制的辩证法。

在同样的程度上，在一种非常笼统的意义上，最后一部分可以说成是**结构的**，因为与第一部分不同，这一部分假定了一种严格的封闭概念，采取了格雷马斯（Greimas）符号学矩形的形式，提出了它的有限数量的概念组合和可能性。这种符号学的技巧现在用来勘察探讨的不是意识形态的多样性，如在第一部分里那样，而是美学上的多样性或“多元主义”。实际上，它产生于我自己和其他人的某种气恼，他们和我对现代艺术的（该部分中指建筑的）形式和风格中无限的、难以驾驭的丰富性，常常表现出自己的热情，而这些形式和风格从现代的目的中解放出来，现在以大量新的、令人鼓舞或激人进取的方式成了“无规则约束的”东西（这些形式、风格人们最好不要称作“新的”或独创性的，因为正是从那种旧的现代主义对“新颖性”的禁忌中获得的解放，像魔棒似的使后现代获得自由，达到它无法想象的当代的繁荣）。就我自己的情况而言，我想恰恰是“风格”的概念——从前一个时期我就非常熟悉——长期使我不能摆脱这种无限多元论的影响，但这影响是否定性的，因为它使人确信，经过以个人为中心的主体统治之后，个人风格本身已不再可能。同时，它将整整一个时期归纳为某种一般化的时代风格，例如巴洛克或哥特式的风格，似乎不仅是难以容忍的唯心主义的，而且也是非辩证的；它未能考虑此后在当代或后现代的生产中，整个前一时期的和世界的风格一直历史地持续到我们现在（现在几乎以调停的方式充斥着那些风格）这一绝对事实所发生的作用。换言之，后现代还被它所包含的各种可能的风格从构成上加以限定，因此，从外部看，它自己的包容能力在总体上具有任何一种特殊风格的特征，也就是说，它抵制美学或风格的**整体化**（这种美学上的抵制，可能正是不正确地抨击政治或哲学上的整体化时总有的意思）。

因此，我过高地估计了实际存在的后现代“风格”的多样

xv 性，似乎忘记了结构主义的基本教训，即一种整体性是一种结合或置换的结构，不论它的过程具有多么不可言喻的历史性和流动性，其本身也有一种封闭性。这就是说，任何想把这种过程概念化的企图——例如，采取混乱或灾变理论——只有赋予它们一种表现才可能实现，而表现本身就是一种封闭的形式。不过，环境的封闭和对其反应的封闭之间有着根本的区别：后者仅仅是唯心主义的，因为它在反应当中，在行为或作品或风格当中，而不是在物质环境本身当中假定一种结构上的限制。我在建筑作品本身当中寻找那种限制（如果能找到它，如像它在某些历史时期那样，这种形式上的限制将采取一种特殊的时代风格的形式）。但事实上，结构上的限制要在环境或困境中发现，个人建筑师以及他们的独特的设计都必须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对环境或困境作出反应。

如果谁认为我的论述以某种方式冒犯或伤害了建筑师本身，或所有难得的天才的艺术家——这些人我都非常敬佩——那他就还不明白创造性应在于反应之中，而不在于环境本身最初已有的东西或原始的材料之中。关于自由和不确定性的错误，即认为它们对这种讨论形成哲学和形而上学的连带后果，也属于一种类似的性质：它把旧式决定论的因果关系归于对结构限制的版图绘制，而对于结构限制，因果关系毋宁被重新解释为**可能性的条件**。就像纪德（Gide）的拉夫卡迪奥（Lafcadio）那样，谁都不想成为可以被预言的人，谁都不想事先被充分了解（他们认为，上帝、“整体化”或决定论倾向于做那种事，倾向于预先决定你对虚假的创造性作出最少误导的努力，或徒劳地运用一种虚假的自由意志）。确实，限制的学说走得极远，并作为一种内在的情境深入到个人的精神深处和结构的形成中，而在这种内在情境之内，同样需要一种缩小的个人自由发生作用。这种学说并不完全排斥或消除能动作

xvi

用，相反，它恰恰使这种能动作用的详细说明成为可能。

我对建筑上的后现代主义的封闭性所画的小图表——其本身只不过是个概略，就像在第一部分一样——并不想预言未来，设想什么东西会克服这些对立（或者被它们变得中立或麻痹）。相反，它受到黑格尔（Hegel）的旧观念的激发，就是说，当我们识别一个界限或一种局限（康德 [Kant] 所说的限制）时，我们仍然会稍微改变那种受限制的情境、那种绝对局限的情境或经验，把整个情境纳入它自身之内，使这个限制成为它迄今已经限制的范围内的一个部分，从而它自己也发生改变。但是这一模糊的目的或奢望，那时也与结构主义的限制相一致，而结构主义在达到真理或决定的阶段，达到某种实践的前景时，它的精确性总是消失，变成昏暗不明的东西。

剩下的一部分，即第二部分，从这些其他的后现代讨论中突出出来引起人们的注意，几乎脱离了我这里评论的秩序。根据弗洛伊德或深层心理分析的方式，从形式上也许它最好被说成是关于压抑和否定的问题，甚至是崇高的问题，也可能是哀伤的问题。因为在除了字面之外的各种意义上，我们这里都面临着已经从后现代场景中消失的东西（因为正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在一种全球性后现代文化倾向的统治时期，普拉东诺夫 [Platonov] 的这一十分重要的作品，以及其他一些作品，才被重新发现并第一次出版）。

那么，这里我们必须考虑现在应该说是第二世界的文化，一种新出现的社会主义文化——这种文化以其东欧或南斯拉夫的形式发展，现在已经中断。我想论证的是——至少这里的第二部分包含这样一种论证——不仅存在一种特殊的第二世界文化，其独创性可以通过它脱离商品拜物教部分地得到说明，而且在西方被称作不同政见的事物，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那种文化的一部分，正如目击者索尔仁尼琴（Solzhenitsyn）所愤怒地发现的，尽管佛蒙特是非共产主义的，但它是腐败的、西方的、资本主义的，与任何斯拉

夫的或苏联的共产主义者一向预言的情况毫无二致。因此，不同政见是知识分子生活的一种第二世界的形式，其美学实践者的反共产主义看法，并不会使他们成为第一世界的作家或艺术家，就像在这里反对美国政府，并不会使我们不是资产阶级一样。

我这样说的原因是，虽然在我看来普拉东诺夫的乌托邦不是反讽性的，但它所产生的可怕景象和幻象，预先未获警告的读者很可能认为是反讽性的，认为那是反共产主义的论点而不是对共产主义经历的表达。换言之，我想论证的是，《切文古尔镇》的真正暴力——我们当中有些人几乎无法忍受——恰恰是为其乌托邦冲动的真实性所付的代价（因为那种冲动在新的、永远消除自我的修辞潮流中产生出它的文本）：为拯救乌托邦不使它在西方的地位单纯化而付出的代价。但正是这一切一定要详细地论证——包括乌托邦幻象中一切粗野和原始的东西，它的乡下人民肤浅简单的头脑——以便使我们再次抓住从后现代世界观中漏掉的东西，更确切地说，抓住过去不得不以某种新的暴力从中压制的东西，使那种“世界观”（当然，在旧的意义上它并不真正是一种世界观，而是以实证主义和技术统治取消所有的世界观）首先形成存在。因此，这一部分是其他两部分间的一种缓慢的过渡，它使某种过去的反响处于适当的位置，虽然这种过去在结构上并不出现，但一定也大致上限定了我们即将到来的未来，这个未来几乎比我们当下的一些最明显的部分更好。

xviii

题写一位老朋友的名字，是为了感谢他在知识和社会方面的款待，这还将从另一个范围来限定此书，将一种全球的（但仍是西方的）后现代性与中国本身巨大的异序元素并置起来。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于康涅狄格州吉林沃斯

目 录

作者前言	1
第一部分 后现代性的二律背反	1
第二部分 乌托邦、现代主义和死亡	63
第三部分 后现代主义的束缚	115
参考书目	183
索引	188

第一部分 后现代性的二律背反

通常人们总把二律背反与矛盾区分开来，这主要是因为人们在知识里包含着后者容易解决或消除，而前者不容易解决或消除的观念。在那种意义上，二律背反是一种比矛盾更清楚的语言形式。它使你了解自己的立场。它代表两种本质上不可调和的观点——实际上是绝对不可调和的观点，要么接受要么拒绝。而矛盾是关于偏向和方面的问题，只有一部分与伴随的观点不可调和，实际上，它更多地涉及力量或者事物的状态，而不是词语或逻辑的含义。从长远看，矛盾被认为是生产性的，而二律背反——如康德的经典例子：世界有一个开始，世界没有开始——根本不提供什么解决的办法，不论你多么努力地反复考虑。

所有这一切可能意味着，矛盾是个单一的存在，围绕它可说出多种不同的、看似矛盾的东西；稍作努力，稍微有些独创性，就足以说明两种矛盾的事物以某种方式互相关联，或者相同——一种事物包含着另一种事物，或者不容怀疑地由另一种事物引起。在那种情况下，恰恰是境遇导致了不同，其本身的不完整性引发出多种观点，使我们觉得手边的问题现在是 X，或者是 Y；或者更确切一些，同时既像 X 又像 Y。然而，二律背反明显地、毫无疑问地是两个不同的事物：X 或 Y，而且两个事物完全不同，境遇或语境根本不能说明问题。

非常明显，时代更适合二律背反而不是矛盾。甚至在后者的精神故乡马克思主义当中，最先进的倾向也对矛盾感到困扰不安，就像对某些最后无法消除的、能够以某种致命的旧方式（如

幻想或头脑发热)使体制再次感染的唯心主义残余似的。因此,最杰出的马克思(Marx)主义评论家卢西奥·科莱蒂(Lucio Coletti)便开始利用康德来反对辩证法,并说服他自己(和我们)相信矛盾不是自然存在,因为自然里的一切现象都是确定的。就康德而言,我认为他在这里是错误的,因为按照康德的看法,显然只有“在自然里”(或更确切一些,在他所说的“显得真实”的情况里)才真正存在对立。事实上,科莱蒂在这里卖弄的批评观点被称作实证主义,而这使他完全离开了马克思主义。(不过,毫无疑问,今天再回到康德,一般都有一种反辩证行为的意义。)

一位更伟大、更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似乎已经认为他的使命是一种坚定的现代化(或后现代化)的使命,其目的是清除马克思主义中一切多余的黑格尔的东西——也就是说,德意志的和唯心主义的东西。他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怀疑调和的概念(确实,这个概念必要时可以被转码的概念代替),但人们有足够的证据认为,他的意思是加速前进,最终玷污并驱除矛盾概念本身。事实上,他的这种考虑曾引起他的更间接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辛迪斯(Hindess)和赫斯特(Hirst)的不断思考。他们的例子使人们感到疑惑,不知道是否还有其他什么处理方式也能够使马克思主义如此地完好无损。

如果这些是马克思主义内部正在发生作用的最先进的倾向,那么也许不需要去想象马克思主义之外正在发生的情况了。与矛盾的一般概念相同的情形在各种精神分析里继续存在,甚至当列维-施特劳斯(Lévi-Strauss)继续强调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的矛盾概念对他的重要性时,结构主义本身以及伴随出现的符号学,也倾向于推进使矛盾的范畴转向更合逻辑的二律背反的范畴。但这第二个术语的流行(它本身对实证主义的流行形式同样也不重要)我们似乎主要归功于解构主义,在解构主义当中,尤

其在保罗·德·曼 (Paul de Man) 的手上, 它变成了一种工具, 用以揭露同时对某种思想及其语言自相矛盾的一切事物, 而其语言本质上的瘫痪性和非生产性在一种概念的凝固框架里被突显出来。不过, 对矛盾的某种回归, 似乎在黑格尔式的拉康主义中已经列入了今天的日程, 其中斯拉沃热·齐泽克 (Slavoj Žižek) 关于“症状”的概念, 提出了一种对弗洛伊德 (Freud) 和马克思的重新思考。 4

我自己的感觉是, 不应假定一种我们必须在这两个范畴之间进行选择的境况 (或许矛盾意味着现代主义的选择, 而二律背反更多是提供一种后现代的选择), 而应根据任一个范畴以其独特的方式在最重要的意义上使另一个受到怀疑的情况, 同时运用这两个范畴并使它们彼此相对。确切地说, 两者本身并不形成一种对立 (如果假定它们形成对立, 并试图决定它们的差异是否等于一种二律背反, 或差异本身是否只是另一种矛盾, 那倒是一种引人感兴趣的逻辑训练); 相反, 它们意味着彼此的弱点, 意味着固执于概念本身的一些怀疑。疑惑二律背反是否真的不是一种掩饰着的矛盾; 怀有挑剔的想法, 认为我们当作矛盾的东西真的与二律背反没有多大差别——这些互指的怀疑不仅不会伤害思想, 甚至可能对思想有益。

说过这些之后, 我将相应地组织我的“症状学” (symptomatology), 并按二律背反是某种矛盾的一个症状来运作: 这可能要预设一种多维度的模式或形象, 也可能要对我们自己的时代提出一种多维度的概念。我们的时代——技术实证主义或经验唯名论的时代——是历史发展决定的一个时代, 同样也是由选择决定的一个单维度或二维度的时代。这就是为什么那种深度形式 (如果有这种形式存在, 如像史前时期的怪物那样) 倾向于以一种难以辨认之余像的、失真的单调性在表面上突显出来, 以一种逻辑悖

论或文本不合逻辑的形式在会议桌上发光。我们不得不同时在这两个世界里游泳，学会在污染室里操纵遥控手套；假定一个地震仪用细铅笔的精密的线条微妙地在图上把自己的运动刻画出来的本体的影子世界。

这些形象表明，关于矛盾概念的更深层的问题——一个无法解决并在二律背反概念周围没有任何东西与之对应的问题——是表现的。矛盾总是先于表现一步：如果你在它冲突的时刻展示它，你就会刻板地把它冻结，使它倾向于采取二律背反的形式。反之，如果你期待矛盾的解决，你就会使它失去它所有的否定性，使人们觉得像是一种操纵的选票、一种骗局、一种虚假的冲突，其结果已经预先作了仔细的安排。或者你也可以认为，每只脚踩在一个不同的、无法调和的世界的绝对事实（如安提戈涅对克里奥）意味着，一种要对那些特殊世界及其法则保持真实的表现，只能通过无法提供使两个世界似乎虚假地调和起来的第三种表现的语言，展示其资格并记录其真实性。不过，这种境况意味着说明矛盾的哲学语言将永远是不充分的，并且会引起正当的哲学上的不满。甚至黑格尔宏伟体系的一些阶段，也可能倒向中心张力的这边或那边，一方面似乎会强化一种戏剧性或历史性的基本上是叙述的场景，使之成为图像；另一方面或者会使它们缩减为那些同一性和差异的抽象，最终是二律背反的范畴而不是矛盾本身的范畴。

这样的倾向在当代思想里无处不在，它们可以被解释为我在前面说成是实证主义和唯名主义的后一种基本思潮的结果（这里不考虑两个主义之间关系的有趣的问题，而它们可以被分别视为客观的和主观的、系统的领域和主体的领域）。当然，人们总想急匆匆地以当前的语言补充说，这种“解释”只不过是我们关于当前境况所能给出的多种叙述之一。但这是一个好的故事，通过

阿道夫·路斯（Adolf Loos）对建筑和设计中的装饰所作的臭名昭著的攻击可以看出它的先兆，因为在他的攻击中，这种图案装饰一方面可以被比作罪恶和反社会的，另一方面又可以被比作退化堕落的（这在那个时期仍然是个流行的概念）。实际上，在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之后，抽象本身开始被视为某种与装饰相似的东西：它是多余而不实用的，自我放纵的，“思辨的”和形而上的，是一种懒散的、不道德的悠闲和特权的迹象和标志。取消旧的名称，取消所有那些仍然带有普遍性或一般性的抽象，以更大的决心坚持经验和实际，诬蔑残存的事物是坏的意义上的哲学，即纯粹的唯心主义，但不因此而陷入一种同样玄奥神秘的唯物主义——这些是后现代的格言。它们曾是以语言的健康和纯洁为名的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式的政治迫害的指南，但现在却像在你房角的超级市场交货那样毫不费力地在经济中传播着。

这是一种可能不大会成功的归纳，但它当前的统治地位不仅意味着大量表示经典哲学特征的东西必然消失，而且还意味着再不会有什么东西以同一范畴的抽象将一套唯名论和分裂的观点中根本不同的词语结合在一起。这就是当前的境况和危机，两种源于古代的大而不细的分类体系有可能于中重新出现，像是被压制的东西得到恢复似的。它们是一切抽象中最宏伟而又最空洞的，其早期（在西方）的体现，可以在对苏格拉底之前的世俗思想的早期形式基本不作区分中找到说明：它们是最刻板的同一性和差异性的范畴（康德和黑格尔把它们作为概念或反映的范畴），现在保存下来构成最后尚存的、进化的、概念的物种，乃因为它们的优势是本身不提供任何内容，不进行任何哲学的走私，像技术或市场一样中立而不作评价。

7

这些是非辩证的范畴，你必须以某种暴力使它们弯曲走形，才能把它们用于黑格尔的“同一性和非同一性的同一性”。同一

性和差异性毋宁说是二律背反本身的领域和范畴：通过毫不费力的、不要任何借口的彼此转换随时准备展现。由于它们不是辩证的，甚至不是受到抑制或瘫痪了的辩证的，所以最好以一种把弗洛伊德的（现代主义的）“原始话语对立感”的观念颠倒过来的方式来表现它们的特征，这引起我们注意一个独特的术语，如何通过词源学上的透视，证明在它自身内部，伴随着其原始的意义，载有后者的否定或对抗（最有名的，“heimlich”的意思是最熟悉的和个人的，结果竟也表示与“unheimlich”相同的事物，即最不可思议的、神秘奇怪的东西）。这里正好相反，正如那种特殊后现代二律背反的例子，即其中反乌托邦的东西转而在其最基本的意义上成为乌托邦的，恰恰是（我们将会看到）对立的東西转变成“相同”的东西。不过，在后现代的话语中，这种性质的悖论并不常常引起对整个范式重新思考的那种拨弄是非的恶意中伤或反常之举（一个星球不可能与它事先预测的轨道丝毫不差）。确切地说，这里它们提供了一切被称为当代理论（或理论话语）的日常概念，提供了对艺术状态中的思想训练，正如利奥塔（Lyotard）所指出的，这种思想训练并非与诡辩家演示的文字游戏和逻辑技巧毫不相关。

- 8 但是，下面我们将收集一些这样的悖论作为症状来考察，而不是对这种精神本身或其语言在结构上的无能做某种说明。这将采取简单地提出四种截然不同的后现代二律背反的方式，当然，对这些二律背反，人们可以自由地怀疑它们是否并非都是基本相同的東西——在本部分的结论里我们将返回来讨论这种可能。在四种二律背反里，前两种涉及康德的“超验的表现”，即时间和空间问题，我们一般都以历史的方式认为它是隐在的形式框架，然而这种框架会依照生产方式发生变化。于是，从我们倾向于考虑变化和永恒、多样性和同质性的方式里，即证明与空间和时间

同样相关的方式里，我们可能会学到一些关于我们自己生产方式的东西。

因此，后两种二律背反似乎与我们幻想我们整个制度改革的可能性时所用的空间方式有更多的联系。实际上，第三种二律背反提出了严格意义上的自然主义问题，即自然和人性的问题，或者这种限制和约束不出现的问题；而最后一种二律背反，正如我所许诺的，提出了乌托邦（作为一切变化的目标）的问题，以及许多它的当代批评家和敌人的问题——今天这些人甚至比早期更热情地试图说服我们，使我们同意这确实是可能有的最美好的世界。

但是，今天时间是一种速度的功能，显然只有按照它的速率或速度本身才能理解：仿佛旧的柏格森（Bergson）关于量度和生命的对应，即时钟时间和生命时间的对应，已经与虚假的永恒性或滞缓的持久性一起消失，而若无这种持久性，瓦莱里（Valéry）认为一部作品本身的真正思想很可能消亡（他似乎在思想上已经认定了这件事情）。于是出现了某种没有对立面的变化的观念，而这样说等于无助地目睹我们前两种二律背反互相交叠起来，因为从变化的高度不可能区分空间和时间，也不可能区分客体和主体。内心的时间（以及它的器官——“内心深处”的时间感）的消失，意味着我们从外部事物读出了自己的主体性：普鲁斯特（Proust）的旧旅馆房间，像老仆那样，每天早晨满怀敬意地提醒他他有多老，他是在度假还是“在家里”，还是在什么地方——就是说，它会告诉他他的名字，向他提供一种同一性，像是银托盘里的一张名片。至于习惯、记忆、认识，那也是物质

9